

康晓光等 著

# 希望工程

## 调查报告



漓江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康晓光等 著

# 希望工程

调查报告

漓江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希望工程调查报告

康晓光等 著

组稿编辑:王建周 张 武

责任编辑:王建周 郑纳新

---

漓 江 出 版 社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541002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 政 编 码 : 541001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西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6.875 插页:1 字数:422千字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ISBN 7-5407-2209-6/G·708

---

定价:(平)17.00元  
(精)27.00元

## 作者序：一项值得关注的事业

“序言”总是在最后完成的。这也许是因为，只有在回过头来审视整个研究过程的时候，才能对初始的立项动机和研究方案以及得出的结论形成一个恰如其分的认识。

这篇自序就算是这种反思的总结吧。

### 我与希望工程的缘分

第一次看到“希望工程”这四个字，大约是在90年代初期。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是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的，还是在《读者》杂志上看到的。

1992年在内蒙古兴安盟考察时，曾经走访过一个贫困牧民家庭，临别时给孩子留下100元钱，嘱咐他买点学习用品。那个可爱的小男孩把自己写的一篇作文送给了我，这篇作文简短地记述了邻居如何帮助他家过年的情景，读来令人心碎。当时，陪同我一路考察的乌兰浩特市规划办的杨主任把我的行为称之为“希望工程”。

1996年我在云南保山地区考察，在一位护林员的家中，我被告知他把大女儿送给了别人，小女儿

杨新叶已经9岁,但从未进过校门,我去她家的那天她不在家,她父亲告诉我杨新叶正在一家国营农场里摘茶叶给家里挣钱。临别时我交给村党支部书记300元钱,请他安排这位小女孩上学。无独有偶,当时陪同我一起下乡考察的地区林业局和旅游局的同志,也把我的行为称为“希望工程”。

这两次经历具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特征,那就是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在参与希望工程,但旁观者都不约而同地认定我在参与希望工程。看来在中国大陆,希望工程已经成为“捐资助学”乃至“慈善行为”的同义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996年年底,国家科委评估中心的王奋宇先生邀请我参加由他主持的“希望工程效益评估”活动。以此为契机,我开始了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正式接触。评估活动的第一步,是由中国青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向项目组成员介绍希望工程的有关情况。办公室主任兼希望办主任涂猛首先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青基金会和希望工程的方方面面,随后,他又组织了各个部门的领导人分别介绍了各个部门的工作情况。这一系列介绍,使我第一次比较全面而概要地了解了中国青基金会和希望工程的基本状况。直觉告诉我,这里有一个蕴藏着巨大资源的研究领域,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未经开发的研究领域。同时,我也深切地感到,作为一位中国学者,有责任在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中作出自己独到的贡献。

## 值得关注的事业

自1989年3月成立以来,中国青基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使贫困地区150多万已经失学、濒临失学或从未上过学的儿童走入课堂;为贫困地区修建、改建、新建了近4000所希望小学;为贫困地区送去了8000套“希望书库”;表彰和培训了数千名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其中绝大多数是民办教师。

希望工程唤起了全社会重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意识,直接推动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它的存在和运作本身,又开创了一种动员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新模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

中国青基会致力于保障中国最贫困阶层的最基本需求,推出了希望工程这一目前在中国效率最高的社会再分配项目,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制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中国青基会还以自己的行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公益意识的形成。

中国青基会的实践,对于共青团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强化为青少年服务的职能、寻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共青团作用和提高共青团地位的有效方式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启示。如果做进一步引申的话,可以说,中国青基会开创了一种政府职能转变的成功模式。

中国青基会还为中国基金会的整体发展开辟了道路并提供了示范。如今,国内任何一个新成立的基金会和公益机构,几乎都要到中国青基会登门求教,或是借鉴项目设计思路,或是学习管理经验,有的甚至直接照搬管理制度。中国青基会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把自己摸索和创造的策略与制度知识,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自己的同行。如今冠以“工程”字眼的公益项目比比皆是,许多公益机构在自己的项目设计中纷纷采取“一对一”模式,利用新闻媒体、大型义演和街头宣传活动进行募捐已经蔚然成风……这一切不能说与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有力示范无关。

但是,最重要的是,中国青基会为现代社会第三部门的起步和发展提供了杰出的先导和示范。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青基会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成功探索对于未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将远远大于今天和昨天。

## 研究社会领域中制度创新问题的价值

自 1840 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持续而剧烈的社会变革之中,1978 年以来,中国又进入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的过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各领域制度创新活动空前活跃,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中国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东方大国。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整体发展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承受着发达世界巨大的示范压力,现代化任务极为沉重;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还是一个正在进行全面深刻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创新的任务格外沉重;与一般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传统要素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与现代文明接轨难度极大。因此,中国的制度创新不仅任重道远,而且必然是一个别具特色的过程,相应地,研究中国的制度创新问题,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市场经济、自治社会和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要素,其中市场经济是自治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市场经济和自治社会又共同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极为迅速,而且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自治社会的发育还刚刚起步,这表现在民间非政府组织不但数量少,缺乏独立性,而且所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与社会需求相去甚远,更为重要的是,自治社会恰恰又是中国最为缺少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青年发展基金会作为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成功发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的经验和教训将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具有重大价值的示范和警示,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同时必将进一步丰富人类社会的现代发展经验。

20年、30年之后,乃至50年、100年之后,今天那些曾经得到过中国青基会资助的孩子们也许都已离开人世,它的工作人员和公益项目也许都已面目全非,甚至机构本身也许都会不复存在,但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忘记它,每一个研究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历史学家,也都不能绕过它。那时他们所记起和关注的也许不是今天曾经感动过无数人的美好而又真诚的故事,也许不是它募集的资金、资助的人数和修建的学校,那时激动人心的,将是它对中国制度创新的独到贡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必将作为中国第一个最成功的民间非政府组织而名垂史册。

在20世纪之前,制度发展领域中最伟大的研究者首推马克思。本世纪初期,西方制度经济学开始形成;本世纪中期,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于是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应运而生;本世纪末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席卷全球的市场化改革浪潮中,转型经济学、转型社会学、转型政治学异军突起,蔚为大观。今天,制度创新、制度发展、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最活跃的研究领域,吸引了世界上众多的一流学者投身其中,也产生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80年代末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制度创新问题,北京和上海的一批青年经济学家在介绍和翻译西方制度发展理论的同时,对中国的制度创新进行了初步研究。到目前为止,国内的相关研究仍局限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即经济领域中的体制创新问题,已经取得了一批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是对社会领域中的制度创新问题几乎未作涉猎。

经过8年的发展,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制度创新活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初步形成了自己相对完备的现代管理体制,拥有较为完整的时间序列资料,这就为对其制度发展进行系统全面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高效率的组织系统也为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提供了组织保障和人员支持。因此,从研究对象



的发育状况来看,现在已经具备了对其制度创新活动进行科学研究的客观条件。

## 本研究的目标与方法

尽管本项研究的对象是中国青基会,但是研究的视野和结论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青年基会。这是因为,你要想真正理解希望工程的来龙去脉,你就必须全面地理解成就了这一项目的中国青年基会;而你要想全面地理解中国青年基会,你就必须深刻地了解孕育了中国青基会的中国社会以及它身处其中的这个特殊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另一方面,我的终极目标是运用个案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第三部门的现状、目标模式和发展途径。个案研究有着独特的价值。一个好的个案,可以使研究者透过它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结构的特征,透过它的演变洞察时代的历史趋势和社会的发展脉络。好的个案就如同一个“透镜”,自身虽然不大,但能够折射出一个广阔的世界,透过它我们可以窥视时代和社会的全貌,乃至世界的过去和未来。我的最终目的是透过中国青年基会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及其演变趋势,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透视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把中国青年基会的实践放到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中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发掘中国青年基会的实践给中国现代化带来的深刻启示。

本项研究运用个案研究方法,以中国的现代化为主线,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角度入手,研究第三部门的发育问题,希望能够总结和提炼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创新价值的制度创新模式,为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未来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依据和具有普遍意义、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

为了保障上述目标的实现,我对研究工作提出了四个具体要求:第一,全面准确地掌握第一手资料;第二,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发

展过程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三，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创新领域中取得理论上的突破；第四，总结并推广中国青基金会的发展经验。

在立项之初，我与顾晓今和涂猛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开诚布公的对话。我问：“你们自己实事求是地说，你们敢不敢让我进行客观的研究，敢不敢让我了解全面真实的情况？”顾晓今回答：“我们问心无愧。我们比你更希望你能全面真实地了解我们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高水平的研究，做出第一流的成果。”

中国青基金会对我开放了全部档案，包括：正式文件、内部简报、人事档案、财务档案、审计报告。为了更加系统地掌握情况，我与北京大学社会学调查中心合作进行了八项调查，包括：希望工程个人捐款抽样问卷调查、希望工程单位捐款抽样问卷调查、中国青基会员工个人问卷调查、中国青基金会部门负责人访谈、中国青基金会项目负责人访谈、中国青基会员工典型访谈、云南省希望工程实施情况实地考察、黑龙江省希望工程实施情况实地考察。可以说，本研究几乎动用了社会学调查的所有手段。

为了构造一个具有足够解释能力的理论框架，我借鉴并综合了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社会转型理论和组织管理理论的大量成果。也许是出于职业习惯，在研究过程中，我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刻意追求研究的突破或创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推广中国青基金会的发展经验，这份研究报告没有写成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而是带有很强的普及性。

在立项之初，我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而在研究过程中，我可以说是竭尽所能了。现在一切已经结束，回顾既往，我清醒地知道，我的努力决不是要结束一个研究领域，恰恰相反，它的意义在于开辟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份研究报告仅仅是引玉之作，仅仅是开创“希望工程学”的一种尝试和探索，我衷心地期待着会有更多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那将是学术界对我的

辛勤耕耘的最高嘉奖。

本项研究的成果体现在《创造希望》和《希望工程调查报告》这两部著作里。考虑到中国青基会不仅创造了给千千万万少年儿童带来希望的希望工程,而且还在为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创造希望,因此我把正式发表的研究报告取名为《创造希望》。这一名字也蕴涵了我对自己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期待。在写作期间,我的朋友田朔宁曾经对我说:“创造希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机会,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希望工程调查报告》汇集了抽样问卷调查、访谈调查、实地考察和书信档案摘录,它可以使读者直接面对希望工程的捐助者、受助者和操作者,倾听他们的心声,体会他们的情感,感受他们的苦衷。透过这本调查报告汇编,你不但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的主要方面,你还会看到一颗颗充满同情心和责任感的心灵,它们也许并不伟大,但每一颗都是善良的。

### 本项研究的缺失与遗憾

本项研究没有涵盖两个重要的专题,即中国青基会的运作效率和资金管理。这种课题设计方面的“缺失”显然不是疏忽大意的结果,老实说,是“有意为之”。

首先,先于本项研究启动的“希望工程效益评估”项目,将对希望工程项目的运作效率和资金管理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评价。由于希望工程项目在中国青基会的捐赠收入和资助支出中所占比例都在90%以上,因此对希望工程的效益评估,也可以看成是对中国青基会的效益评估。同时,考虑到“效益评估”项目的资金投入规模较大,而且研究队伍的专业配置更适于从事效益评估工作,因此我就自觉地放弃了对这一专题的研究,以免出现低水平重复研究。

其次,一个机构的运作效率是高还是低,不能仅仅根据其某项

效率指标的大小作出判断,而是要在公平合理的比较的基础上作出判断。比较无非有两种,或是与国内同行进行比较,或是与国外同行进行比较。一方面,由于在中国青基会的募捐和资助环节中普遍存在行政化因素,而西方国家的同类机构一般不存在相似的问题,因此在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很难找到具有“可比性”的效率指标。另一方面,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过硬”的私人关系,绝大多数国内基金会都拒绝研究人员的调查。而且在正常情况下,民政部门也不向社会公开基金会上交给他们的年检材料。因此,在国内同行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也是困难重重。

考虑到中国青基金会是一个“基金会”,因此,缺少对机构运作效率和资金管理的研究是不能原谅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将在后续工作中展开比较研究,以弥补本项研究的缺憾。实际上,比较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辨别各个基金会运作效率的高低好坏,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中国的基金会乃至整个第三部门发展状况和趋势的认识。

## 学术规范与理想主义

尽管学术研究严格要求研究者恪守“中立”,不带任何“价值倾向”地进行“客观”研究,但是研究者毕竟也是人,他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也不可能干净彻底地摒弃价值观念对研究工作的影响或干扰。因此,在这里,我开诚布公地承认我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其终极目的就是要为每一个人创造一份美好的生活,建设一个属于全人类的美好的世界。所以,我所提出的中国未来社会领域的理想组织模式、发育途径以及政策建议,都是以我自己的价值取向为指南的,而且我的价值观很可能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深深铸入了全书的每一段文字之中。

实际上,我之所以把社会合作主义体制确定为中国未来国家

与社会关系的理想模式,与其说是客观研究的结果,不如说是个人理想的表白。尽管“个人理想”并不完全是凭空杜撰的没有任何历史和现实基础的痴人说梦,但是它毕竟不是扎扎实实的实证分析的结论。理想的价值就在于它会激励你为之奋斗,而人世间许许多多的美好事物就是由那些为理想而矢志不渝地奋斗的人们“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我坚信未来决不会仅仅是冷冰冰的宿命,她会给我们留下广阔的选择和创造的空间。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勇气去希望,并且为之奋斗;生命和生活才变得更加富有意义;偶尔抬头仰望秋夜星空的时候,遥远的天穹上那明亮的星光才会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心跳不已,一股飘忽不定的暖流才会掠过久已麻木的心田……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敢于在这部学术著作中展开幻想、写下期待!

由此引申出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今日中国学者应该怎样做学问?

我不反对有些人追求纯理论的突破,乃至于以获得诺贝尔奖为自己学术生涯的终极目标。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如果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那无疑是中国的光荣,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为之欢欣鼓舞。但是我自己则更倾向于这样的治学观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己任,学以承天下之忧,济当世之弱,解时人之惑,使学术永不失其切实的对象,保持旺盛的活力。我想,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还没有资格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为学术而学术”,相反,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解决现实问题之中。无数紧迫而又严峻的现实问题堆积在我们的眼前,令你无法回避,也不能忘怀。在这种处境中,一个人怎么能够平心静气地安坐“象牙塔”中,皓首穷经、孤芳自赏呢?

## 善良是人类的天性

在阅读中国青基会保存的书信档案过程中,在进行实地考察和访谈的过程中,我了解到那么多感人的故事,接触到那么多美好的心灵。如今已经记不清了,曾经有多少次感动不已,有多少次难以抑制盈眶的热泪,又有多少次心灵的净化和人生境界的升华。但最重要的是,这种人生经历赋予我一种信念,使我坚信善良蕴藏于人类的天性之中。为别人的痛苦而痛苦,愿意伸出救援之手帮助别人解除痛苦,并因为自己的这种行动而感到幸福和满足,认为通过帮助别人能够拯救自己,这就是善良。在这个红尘滚滚的世界上,尽管人欲横流、弱肉强食,尽管充斥着贫困、愚昧、暴力、腐败和不公正,尽管金钱、暴力、色情和强权正在征服越来越大的空间,但仍有人性的光辉在闪耀,仍有善良的人和善良的行为。希望工程赢得的广泛支持,向人们宣告:人世间总有好人,即使是不好的人也会有良心发现的一刹那。

在千千万万捐助希望工程的人中,有老人,也有儿童;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官员,也有平民;有富人,也有穷人;有英雄模范,也有死囚犯;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信仰共产主义的,也有信仰资本主义的;有佛教徒、道教徒,也有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究竟是什么使希望工程能够超越年龄、性别、职业、地位、贫富、阶级、民族、国籍、信仰和仇恨的鸿沟?我认为那就是人类共有的天性——同情和善良。在一次访谈中,郗杰英对我说:“同情心是希望工程的第一推动力,她潜藏于每个人的心底。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人类创造的结果,也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幸福。社会的效率、公平与正义需要政治、法律和制度的安排,也需要道德的引导和约束。在高速发展变化的现代社会,启动人的同情心,挖掘人的善良天性,丰富人的道德情感,促进社会

的协调发展,应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世间有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苦难的麻木,可怕的是对别人苦难的无动于衷甚至于残忍地玩赏。没有什么苦难可以摧毁人类追求幸福的信念,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人类追求幸福的步伐。只要每一个人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鼓起勇气去征服苦难,那么我们就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充实的人生和美好而又温馨的世界。这就是希望工程告诉我们的真理。

愿我的这本书能对这一伟大的事业有所推动,愿这一伟大的事业赋予它不朽的生命。

## 致 谢

中国青年基会为我的研究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不但开放了全部档案,还积极支持各项调查工作。徐永光、顾晓今、涂猛、李宁、郝杰英、柳杨、陈建平、李亚东、杨晓禹、崔子研、王旭东、王汝鹏、王宁、刘文华、甘东宇、张传远、沙郁芬、陶海心、陈迈、孙文华、雷桢孝等人在百忙之中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访谈。程刚先生不但帮助我们建立了抽样问卷调查的样本框,还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统计数据。路淑卿女士帮助我们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重新统计了纷繁复杂的财务档案。姚晓迅、顾蒸蒸帮助我完成了大量的联系工作。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涂猛先生撰写的《希望工程介绍提纲》和何继宁先生撰写的《中国青年基金会组织建设概略》,前者简洁明快地勾勒出了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年基金会的总体结构和发展过程,后者梳理了中国青年基金会组织结构演变的基本脉络,这两篇文献使我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建立起关于中国青年基金会的总体认识。

在我对黑龙江希望工程实施情况进行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得到了黑龙江省青基会秘书长谷为和副秘书长张晓光的大力支持,大庆市团市委书记赵希江和副书记王玉也为考察提供了必不可少

的帮助。云南省青基会秘书长张荣明细心地安排了我在云南省的考察活动,杜华杰先生还不辞辛苦地陪同我完成了整个考察过程,楚雄地区武定县团委书记冯毅亲自带领我走村入户进行调查。他们的帮助不但使本项研究所必须的实地考察得以顺利完成,还丰富了我们之间的个人友情。我将把与他们共同度过的短暂时光,作为最可贵的人生财富深藏在心底。

解海龙先生和黄传会先生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还向我讲述了自己参与希望工程的过程,并让我分享他们宝贵的人生阅历和独特的人生感悟。

在研究工作的不同阶段中,北京大学社会系的孙立平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折晓叶女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分析室的胡鞍钢和王毅先生、自由职业者王力雄先生和梁晓燕女士,分别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使本项研究增色许多,而且他们给予我的鼓励,对研究工作的顺利推进也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杨团女士不但毫无保留地提供了参考文献,还向我陈述了她的各种见解,使我受益匪浅。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秘书长娄晓琪先生、北京市文化发展基金会办公室主任何公明先生和赵双满女士也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热情的鼓励。福特基金会的米切尔女士友好地允许我分享她那份独具慧眼的调查报告。

深圳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慷慨地资助了本项研究。漓江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积极支持研究报告的出版,他们高质量的工作弥补了我写作方面的疏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德寰先生、邵惠波先生、王俊敏小姐、王文韬先生与我密切合作共同完成了本项研究的各项调查工作。我的妻子冯利博士始终如一地支持我的研究和写作,她的支持和鼓励是本项研究得以如期完成的必要条件。



最后,请允许我把《创造希望》和《希望工程调查报告》献给上述所有的朋友和亲人,借此再一次表达我对你们的真诚感激。我也要把这两本书献给8年来所有支持过希望工程的人们和青基会系统的全体工作人员,借此表达我对你们崇高的敬意。我还要把这两本书献给所有希望工程受助学生以及他们的亲人和老师,愿爱心和希望与你们同在,愿未来的中国再也没有一个孩子因失学而痛哭失声。尽管在你们之中也许没有几个人能够有机会看到这两本书,但我仍然要写下我心中的祝愿。

康晓光

1997年11月30日,北京肖庄